

中国共产党简史学习提纲(初稿)

(三)

中國共產黨簡史學習提綱(初稿)

(三)

初級組學習參考材料
“學習導報”編輯室編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節 中國紅色政權的建立(一九二七年 八月——一九三一年九月)

一、革命低潮時期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國內政治經濟狀況的特點是：蔣介石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代替了北洋軍閥的舊統治，更加徹底地投靠帝國主義和殘酷地壓迫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革命暫時轉入了低潮。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表示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及其力量對比有了很大的變化。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民族資產階級追隨着大資產階級，成為大資產階級進行反革命的助手。上層小資產階級從動搖而離開了革命。革命力量只
離革命，革
黨成為唯一
的革命政
蔣介
建立起來的

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統治，是一種新軍閥的統治，與舊軍閥相較，有以下幾個特點：（1）這些新軍閥在未叛變革命以前，曾在一定限度內參加過革命，因而對羣衆有過某些影響，背叛革命後，這種影響雖會消失，但在一定的時間內，他們却可利用這種影響作為反革命欺騙的本錢，以補其軍事恐怖之不足。（2）這些新軍閥篡奪了曾經成為各個階級革命聯盟的政黨——國民黨的領導權。並篡用了國民黨的歷史名義，把它變為反革命的政黨。這樣，這些新軍閥就有了一個以政黨——國民黨為形式的集中組織，作為自己反革命的工具，因而獲得了舊式軍閥所沒有的反革命的便宜。（3）這個新軍閥統治是帝國主義者所策劃上台的，它比舊軍閥的統治者更加徹底地依靠帝國主義。各帝國主義者不僅利用這種新軍閥的統治而捲土重來，恢復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的聲勢，並且還在進行新的覬覦。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支配下，國民黨新軍閥的內戰和以前一樣地循環不息，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混戰，正是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爭奪中國的矛盾和鬥爭。

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中國人民大眾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比以前更加殘酷更加嚴重了。工人階級在革命失敗後，立即失去革命鬥爭中所爭取得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工會被封閉和解散了，大批的工人領袖和積極分子被逮捕和槍殺了，工人沒有罷工示威的自由，沒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工資降低了，工作時間延長了，勞動強度提高了，工人生活愈益沒有保障，失業工人一天天增加。農民在革命中所爭得的權利，也全部被地主豪紳所奪回，且所受重租、高利貸、兵差和苛捐雜稅的壓榨更加嚴重，以致耕地減少，荒地增加。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國民黨法西斯統治

和黨化教育之下，毫無民主自由。學生畢業以後大多找不到職業。城市小資產階級（小商販等）由於苛捐雜稅的不斷增加，迅速地走向破產。民族資產階級在叛變革命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權力，而在經濟上，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官僚資本的壓迫，却受到了新的打擊，因而地位日益下降。

總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但是，由於引起革命的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革命發展的基礎仍然是很深厚的。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雖然比以前的軍閥更加兇惡，但這個反革命的統治基礎是脆弱的。蔣介石統治的根本弱點，就是它的脫離人民和它的內部衝突；其次，它的主要力量只能放在城市中，而不可能在全國極為廣大的農村中普遍建立強有力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各派軍閥的不斷混戰，更加加重了蔣介石這一方面的困難。所有這些，就決定了中國革命會很快地走向高潮的。這是中國革命形勢的本質的一方面。

上述情況清楚地說明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第一、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國家的真正統一沒有完成；第二、封建土地制度沒有被廢除，封建勢力沒有被肅清；第三、國家政權仍為帝國主義支持之下的豪紳買辦資產階級所掌握。因此，把中國革命估計做已經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革命，那是不對的。同樣，把中國革命估計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把革命估計為“不斷”革命而要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傾向，是一個錯誤。這個提法，排除了中國革命為半殖民地革命這個最大的民族特點，這種錯誤是特別有害的。

在革命已經失敗，國民黨反動派已建立了他們的反動統治

的情況下，黨的任務，就是要向人民大眾指出繼續進行革命鬥爭的必要，從而領導人民走上恢復革命鬥爭的正確道路，為此，黨就需要好好地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糾正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迅速收集革命力量，在敵人進攻面前組織有秩序的退却和防禦。這就是說，需要將黨的一部分組織轉入國民黨反動統治比較薄弱而革命比較有基礎的農村中去，領導農民進行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創造革命根據地，逐漸包圍城市以至最後奪取城市；一部分組織繼續留在城市，轉入地下，進行隱蔽活動，以便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並配合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以爭取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

二、中國紅色政權的創立

1. 南昌起義、八七會議、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當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勢力異常危急的時候，黨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是黨獨立地領導革命的武裝力量、向反革命進行武裝鬥爭的開始。因此，南昌起義就成為中國人民軍隊誕生的日子。但是，南昌起義的領導機關沒有認識到武裝起義和農民運動結合的重大意義，因而舉行起義以後，沒有向農村進攻，却南下遠征，企圖重新佔領廣州和廣東，結果大部分革命力量在和優勢的反動軍隊作戰中遭受了損失。

在革命的危急關頭，黨於八月七日在江西九江召開了黨的中央緊急會議以決定挽救革命的對策。八七會議尖銳地批判了和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

方針，號召全黨和人民羣衆繼續革命的鬥爭。這些都是正確的，也是八七會議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却爲“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當時的領導機關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沒有根據各地區的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對比，去組織正確的反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允許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傾向。八七會議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和過火的黨內鬥爭，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

黨在八七會議上，爲了挽救革命，曾經號召農民進行秋收起義。湘、鄂、贛、粵四省是革命基礎較強大的地區，黨就決定了首先在這些省份發動，並派毛澤東同志到湖南去領導秋收起義。秋收起義擴大了黨在農民羣衆中的影響，土地革命的口號深入到廣大農民羣衆中，而且凡是對這一部分武裝部隊實行了正確領導的地方，那裏的革命武裝鬥爭就逐步發展了起來，這些部隊就是後來中國工農紅軍的最初來源。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黨的領導下，廣州工人和士兵也舉行了起義，而且起義開始就建立了工農民主政府——廣州公社，提出了革命政綱。起義第三天，國民黨反革命軍隊聯合起來向廣州進攻，帝國主義更以軍艦爲之掩護。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廣州起義又失敗了。

2. 第一次“左”傾路線的出現及其被克服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仇恨，以及對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反映到黨內來，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

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黨的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後來又繼續滋長，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爲左傾冒險主義，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的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

十一月黨中央擴大會議在瞿秋白同志領導下，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反對退却，要求繼續進攻，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不論鄉村或城市都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起義，並提出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和沒收怠工的工廠主工廠的主張。同時，組織上的宗派打擊政策也發展了。

這個“左”傾路線一開始就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區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批評與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內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3. 井岡山以及其他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土地革命的發動，農民游擊戰爭的開展和紅軍的創立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同志率領新成立的一支工農革命軍，向湖南江西兩省交界的井岡山進軍，在那裏成立湘贛邊區工農政府，擊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並着手領導農民分配土地。以井岡山爲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在朱德同志所領導的部隊和彭德懷同志所領導的部隊會合以後，逐漸擴大起來。在這一期間，黨所領導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西等地的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鬥爭，也有了發展，陸續成立了幾支紅軍和幾處革命根據地。

一九二九年，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領導的紅軍向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進發，並以江西瑞金爲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向井岡山的進軍，乃是揭起農民土地革命的大旗前進的。凡是紅色政權所在地和紅軍所到的地方，農民羣衆都發動了起來，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鬥爭。土地革命在農村中燃燒起來了階級鬥爭的火燄，人民武裝迅速擴大了，農民的游擊戰爭廣泛地開展起來了，紅軍也創立起來了。

毛澤東同志領導紅軍向井岡山的進軍，是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進攻結合起來的最好典範。向井岡山進軍是當時全黨最有計劃、最有秩序的退却。但它的意義，不僅直接保衛了這個退却的革命力量，而且同時又開闢了一種新的進攻。這就是說：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使我們不能不從大城市退却下來，但革命失掉了城市却又在某些地方武裝佔據了農村，開始了一種新的進攻，革命進攻的方向是轉移了，轉移到反革命統治力量薄弱、矛盾較多、而革命有較深厚基礎的農村。進攻的直接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當時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進攻的道路是土地革命、武裝鬥爭與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是極大胆的進攻，又是極清醒的進攻，是看準了敵人要害的攻擊。

4.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爲着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並分析革命性質和當時的革命形勢，從而規定黨的鬥爭任務和策略方針，克服當時黨內由於革命失敗所引起的思想混亂，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國共

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總的革命任務是建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工農民主專政，並發佈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大會提出了建立紅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的任務。

大會指出了革命失敗後的政治形勢是處於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潮，指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新的革命的高漲不可避免地會要來到，因此，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城市的起義，而是爭取羣衆。

大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認為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自願地斷送了革命的領導權，但陳獨秀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正確路線，放棄自己的錯誤路線，反而走上了與托洛茨基分子結合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道路，因此，黨就在一九二九年驅逐他們出黨。大會也批判了“左”傾盲動主義，指出了盲動主義者在敵人力量佔絕對優勢的大城市所舉行的武裝暴動都是脫離羣衆的軍事冒險，是與爭取羣衆不能並存的，因此盲動主義是黨內最危險的傾向。

這些就是大會的正確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但同時大會也有缺點和錯誤。

第一、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對黨在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別是需要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這個關鍵問題，還沒有必要的認識。因此，大會後，黨的中央機關仍然留在城市，黨的工作，仍然以城市為主而未以農村為主。

第二、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

正確的估計。大會沒有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在蔣介石政權下的地位及其兩面性，因而未能預見到這個階級的政治態度有變化的可能，却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大會又簡單地認為國民黨各派完全是反動的，而沒有把他們區別開來，孤立其中少數最反動的敵人，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以便各個擊破。

第六次大會的這些缺點，曾經妨礙了黨內“左”傾錯誤的徹底糾正。

5. 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同志領導革命力量向井崗山進軍後所創造的革命根據地和他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以及其他同志在其他地區所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和他們所領導進行的革命戰爭，已成了新時期中國革命鬥爭的主要內容，成了全國政治生活的重要勢力，成了蔣介石及反革命統治的最大威脅和全國勞動人民的最大希望。但是，並不是當時黨內所有同志都認識了這條道路的正確性的，當時黨內對這條道路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有些同志仍然幻想以大城市為中心舉行武裝起義，並以此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在根據地內，有的同志對在四圍反動統治的條件下，紅色政權能否存在與發展存有疑問，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針對這些情況，毛澤東同志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兩篇論文中，對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理論上作了充分的論證。

毛澤東同志認為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主要條件有如下五個：

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的地方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權之間的分裂和戰爭，給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機。

第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影響，還遺留在中國的廣大區域的人民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兵士羣衆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

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繼續向前發展的。毛澤東同志指出：“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着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①

第四、有了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

第五、有領導紅色政權的組織堅強、政策正確的共產黨。

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在白色政權四圍中的紅色區域，必須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內容：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武裝鬥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這三者是密切聯系着的統一整體。農民土地革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和基礎，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但是，武裝鬥爭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如果沒有根據地為依託，同樣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沒有根據地的紅軍就會變成流動式的武裝，因而就不能與地方廣大民衆密切地相結合，既不能勝利地進行戰爭，也不能發展壯

①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第五四面）

大。因此，所謂武裝鬥爭即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鬥爭，又是有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武裝鬥爭、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這三方面的有機結合的總概念，就是“工農武裝割據”的觀念，就是建立紅色政權的觀念。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澤東同志仔細地論證了中國紅軍戰爭的意義。他指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①毛澤東同志認定：必須放手發展紅軍戰爭，發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權，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找出了中國革命在城市中被強大的敵人擊敗、暫時無法在城市中取得勝利的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發展規律，即以武裝革命的農村，包圍並最後奪取反革命佔據的城市。

毛澤東同志還為黨制定了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即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而僅僅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的階級路線，從而領導農民完滿地解決了土地問題。

6. 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對於黨的建設的重大意義

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是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在當時革命根據地中，要建設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必須徹底糾正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因為當時“黨的組織

①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版，第一〇四面）

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所構成的”。^㉔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宗派性及一切其他不健全的習慣和思想，也就會時常侵入到黨內來，極大地妨礙着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那末，在這樣戰鬥的農村環境中如何建黨呢？

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大會上，毛澤東同志總結了建軍以來紅軍中的共產黨和各種錯誤思想鬥爭的經驗，寫成了大會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解決了黨的建設中的許多基本問題。

毛澤東同志規定的建黨原則，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進行建設，同時也在組織上進行建設。毛澤東同志強調了思想領導和政治教育的意義，認為要建設一個完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就必須和那種作為小農和小資產階級狹隘性的思想——“主觀主義”對立起來，和它鬥爭。毛澤東同志指出糾正主觀主義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㉕

其次，毛澤東同志認為要建設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在組織上必須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對不正當地限制民主，也反對不正當地限制集中，因此，就必須和那種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個人主義、小集團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對立起來，和它鬥爭。

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中，也規定了建軍的基本原則，他認為紅軍必須是服從於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於人民鬥爭和

㉔ 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版，第八九面）

㉕ 同上書，第九六面。

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工具。而這樣的軍隊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建設起來。爲此，必須在紅軍中建立和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使黨成爲紅軍中堅強領導和團結的核心，必須在紅軍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不斷加強紅軍中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使軍隊完全服從於黨的領導，使紅軍戰鬥力不斷提高。

從上述根本思想出發，紅軍必須同時負擔起打仗、做羣衆工作和籌款的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就是說，紅軍除了打仗以外，還要擔負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黨的組織等項任務。

紅軍還必須建立正確的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必須有瓦解敵軍和爭取俘虜的正確政策。

毛澤東同志上述的建黨建軍思想，就使中國共產黨成爲列寧、斯大林式的布爾什維克的黨，就使紅軍成爲一支有高度政治覺悟，有廣大羣衆擁護的不可戰勝的人民軍隊。

三、中國紅色政權的發展

1. 國民黨統治區革命運動的恢復。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

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的一個時期內，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和工作，已有了相當的恢復；特別是在毛澤東同志的指導和影響之下，全國各地的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逐漸發展了起來。一九三〇年，全國紅軍已發展到約六萬人，江西中央區的紅軍已有三萬幾千人。在一九三〇年和稍後的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範圍已發展到福建、安徽、河南、陝

西、甘肅等省和廣東的海南島。

2. 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出現及其被克服

在國民黨統治區革命運動的恢復和紅色政權的發展的形勢下(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黨內的“左”傾思想，又有了某些發展。而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閻馮戰爭爆發後的有利於革命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

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綫)的原因：

第一、是由於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羣衆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

第二、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首先要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

第三、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

第四、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

在這些錯誤的認識下，立三路綫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

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爲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批評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

但是立三路綫在黨內統治的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爲凡實行立三路綫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綫。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更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閻馮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綫。

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雖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綫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綫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但已經結束了上述作爲立三路綫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綫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妥協的錯誤。不過，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綫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及其以後的中央還是濃厚地存在着。

3.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路線和反對敵人 三次全面圍攻的勝利

紅軍的迅速發展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擴大引起蔣介石極大的震動。從一九三〇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對中央紅軍組織了三次圍攻，結果都被粉碎。中國工農紅軍粉碎敵人三次圍攻的勝利，是在毛澤東同志規定的作戰原則的正確指導下取得的。

毛澤東同志為紅軍規定的戰略戰術原則，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爭學說，深刻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掌握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客觀規律而規定出來的原則。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分析，中國革命戰爭有四個特點：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敵人的強大。第三、紅軍的弱小。第四、共產黨領導和土地革命。毛澤東同志說：“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①

從這個根本規律出發，毛澤東同志認為必須充分利用敵之弱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羣衆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這就是說：紅軍必須承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承認只有主力

①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版，第一八九面）